台湾清史研究一瞥(续三)

戎　笙

丁、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台湾学者在如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虽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但划分的标准却是一致的，即中国受外力冲击而导致传统社会构造、经济体系、文化思想的全面变迁。这个变迁的起点，便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于外力是什么性质的外力，冲击是何种程度的冲击，变迁是多大范围的变迁，这些问题在台湾学者之间，尽管各有不同的见解，但大家都本着爱国主义精神，谴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颂扬不畏强暴、团结一致、反帝爱国的英雄业迹。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三井指出："十九世纪是帝国主义向外殖民扩张的世纪。像一阵狂风，像一股浪潮，西方重要国家若英法、若意比，莫不争先恐后将视线投注到地球上没有主的土地，或虽已有主而尚待开发的国家，而进行那占领据点、榨取原料、开拓市场、划分势力范围的殖民活动，可以说殖民成为这个时期欧洲政治的主题，外交的重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近代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李国祁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原是与资本主义互相因果的。领土的掠夺与经济的剥削是当时列强对外侵略的两大手段。领土的掠夺固有助于经济的剥削，而经济的剥削亦有便于领土的攫夺。虽然在入手的手法上有先后的不同，但其侵略的终极则一。"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中孚把十九世纪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大陆型帝国主义如沙皇俄国，一为海洋型帝国主义如英法。他说："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盛行时期，俄国为大陆型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其与英法国海洋帝国主义国家最大之不同，为不能容忍殖民地或被征服邦国的观念与制度，与本国有任何由于地理距离所造成的差异。换言之，英法等国为配合资本与工业之高度发展，殖民活动主要作用在攫取海外市场或制造商品的殖民市场，经济活动仍居次要，基本目的则在扩张领土，藉此发展国家力量。"他在1970年出版的《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一书中根据清季总理衙门的档案资料，剖析了沙皇俄国掠夺大量中国领土的事实。他还揭示了美国在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时所扮演的角色。俄国"以对美国开放黑龙江地区，增进两国贸易关系为重点，赢取美国支持俄国兼并阿穆尔计划。"他还指出："十九世纪中叶，美俄两国均系向太平洋东西两岸开拓边疆之国家，两国也多少有感于北太平洋利益范围不容他国插足，以保护新开发边疆地区脆弱之政治经济局面。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分析中国对外关系，曾指出美国与俄国为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国家，因为美国在太平洋上与中国搭界，俄国则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接壤，英法等国均不具备这种地理上的条件。美国驻阿穆尔商务代办柯林斯等亦认为俄人取黑龙江诸地，对人类之文明传播、商务发展以及基督教主义均有莫大贡献，正如英法等国向印度洋等处发展一样。这些意见均反映美国部分政客对俄兼并阿穆尔地区所作感情上的支持。"他还指出，清廷被迫与俄美英法先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无论在精神或实质上，均使中国主权蒙受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害，而当时主持此事或与此事有关之美国外交官员，却对四国天津条约之精神表示赞许，誉为'西

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开端'，和'国际经济事业在中国开路之空前大好良机'，就很难理解了。"

不少台湾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分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向外扩张、推行大陆政策。有的学者指出："日本之蓄意掀起对华战争，实早于甲午之前十年，即在筹议之中。"林明德在1970年出版的《袁世凯与朝鲜》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此一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性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甲午战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日益严重，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现执教于新加坡大学的李恩涵分析了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对中国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更猛烈的掠夺。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叙述了祖国历史上这一血泪篇章，赞扬了前人为维护祖国主权而进行的努力。他在1963年出版的《晚清收回矿权运动》一书中说："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到日俄战争爆发，其间约略十年，西方列强在中国全国性范围内，进行着非常猛烈的利权攫夺的竞争。此项竞争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从政治性的利权，以至经济性的利权；从争夺对清廷政权的控制，以至工商业的控制；从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以至争夺铁路和矿务、掌握中国的金融、海关和航路，都概括在内。英、俄、德、美、法等国都开始把他们大量的剩余资本输入中国，其方式或为政治性的借款，或为企业性的借款，或对金融、贸易、工矿、铁路等事业，作直接的投资。一时各国有雄厚的资本的银行，如英国的汇丰、麦加利、美国的花旗，法国的德华……等等，在中国都极活跃，而且各以其本国的政治势力为后盾。"

不少台湾学者研究了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大多数学者对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后输入了西方科学文化作了肯定的评价。至于道光以后一些传教士在华活动，则受到不少学者的严厉的指摘。例如王树槐在他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中说："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建议中，大多数均主聘请西人为顾问，作为实施新政的指导人员。李提摩太几乎欲使西人代华治理国事。林乐知主张'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教育）'。""他们力主借重外才以行新政。传教士本身便是文化侵略的主要战士，不仅希望他国奉行他们的宗教，更希望他国在文化上与外交上与其祖国亲近。""他们鼓吹变法，怀有强烈的殖民主义的思想。李提摩太建议将中国变成英国临时的保护国。林乐知希望中国将南部两大省租给英国统治五十年。""他们自认为出于'善意'，以'拯救'中国，但其根本精神，无论如何解释，总脱不了帝国主义的彩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境内发生各种政治事件，几乎都有外国人参与。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外国人？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干了些什么？其后果如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课题。深入研究这些课题，有助于我们看清五花八门的脸谱后而隐藏着的真面目，有助于我们识别真诚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勾结与冲突。台湾学者发表了一些探索性的论文和专著，如黄嘉谟的《英人与厦门大刀会事件》，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张玉法的《外人与辛亥革命》，陈三井的《法国与辛亥革命》等等。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中说："列强不仅在中国肆其侵略与抢夺，同时各国之间复勾心斗角，冀以获得更多的权益，因为各国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他们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便不一致：有热心赞助者，有态度冷淡者，热心赞助者，以英美人士为主，日人亦略有所表示，对于此一运动颇多鼓吹之功。俄、法态度殊为冷淡。戊戌变法一事，不仅成为中国本身的政治改革问题，亦成为列强在中国争夺同情份子的机会。政变后，列强为其本身利益起见，公然起而干预，影响政局颇大。"他根据大量的资料，进一步指

出："英美人士之鼓吹中国变法，主要的目的在便利其传教与通商，甚至企图将中国变成英国的保护国，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野心。"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玉法对西方列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然后概括地说："清季国势不振，当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外人的势力早已进入中国，列强在中国获有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外国传教士和商人、银行家和外交人士，参与中国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国革命运动与他们的在华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的态度也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运动。"他把列强对革命的态度，分为三种："其一、维护清政府的存在，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其二，鼓励革命，造成混乱，俾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其三，希望中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稳定中国秩序使商务不受妨害。"当然，正如张玉法所解释的，这三种态度，只是某些国家一度所采取的态度，不是永恒不变的。"大体说来，列强或同情革命，或同情满清政府，悉以其本身的利益为依归。"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列强之所以干预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事务，以及他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完全以谋取本国利益为转移。证之历史事实，这一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列强对辛亥革命如此，对太平天国，对戊戌维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戊、关于太平天国运动

不管人们对太平天国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谁也无法否认它是清代历史上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它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得到证明。查禁《清史稿》的理由之一，是该书对太平天国的论述，代表了清朝遗老的立场和观点。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把太平天国列为纂修《清史》的三大重点之一。从这些方面看，太平天国研究似乎应是台湾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台湾，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已出版十二集，没有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专题论文，该所已出版的四十三种专刊中，没有一本是关于太平天国的专著。其他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出版的太平天国专著，也很少见到。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专题论文，寥寥无几。大部头著作屈指可数，如再版了郭廷以早年编纂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和《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台编《清史》中的太平天国部分，约三十余万字，是特邀简又文先生撰写的。萧一山的多卷本《清代通史》，有将近三十万字论述太平天国。此外，在有关湘淮军的专著中，或在曾李左胡等人的传记中，部分内容论及太平天国。

台湾学者在提到太平天国时，一般都是持颂扬态度，称之为革命，或民族革命，或社会革命。也有少数人为迎合台湾当局的"政战"的需要，歪曲历史、歪曲现实，进行政治宣传。常用的手法是把太平天国的田政制度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先驱，把太平天国的理想社会说成是"共有共享"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有的人还在争论：倒底是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影响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还是欧洲的共产主义影响了太平天国。这是故意把平均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目的在于以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类文字，完全是"政战"工具，不属于学术讨论范围，也不代表台湾学术界，本文不予置评。

一些学者在论述太平天国时，经常处于矛盾之中，既把太平天国作为伟大的革命运动加以颂扬，同时又赞扬曾国藩等人镇压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萧一山对太平天国的颂扬无出其右者。他说："太平天国灭亡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人，用'长毛贼'三字把它的革命精神一笔抹煞；它无疑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为民族革命作为初步的结束，为国民革

命开崭新的道路，倘若它成功了，至少可以缩短国民革命的时间，保存后来为国民革命而牺牲大量的人才用在建设方面。我们的民族复兴或者要早实现若干年”。这是他在《清史大纲》、中所写的一段话，以后又多次征引，作为他“对于太平天国认识的结论”。但是，在他颂扬太平天国革命伟业的同时，却又颂扬曾国藩、李鸿章等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他说：“曾国藩是满清命运的挽回者，李鸿章是晚清命运的支持者。二人关系清末五十年的大局。”他们“打倒了异教的领袖洪秀全，对于民族革命可以说是罪人，但他们在无形中转移了满人的政权，功过亦足相抵。”“我们不宜责备贤者，究竟他们是中国第一流人才，尤其曾国藩是近代最伟大的人物！他不仅要救满清，而且要救中国，不仅维持我们的旧文化，而且提倡科学的新事业。”

台湾史学界的另一位权威郭廷以对太平天国的贬抑达到了极点。他于1955年1月11日在题为《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的学术报告中说：“如果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过有计划的大规模焚书，秦始皇之外，第二个就是洪秀全了。”“太平天国管制区域的名家藏书非付一炬，即用作燃料，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所藏四库全书尽付一炬，真是典籍文献的浩劫。”在经济方面，郭廷以说：太平天国所“造成的是遍地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乎无地不焚，无户不虏，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既然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造成了惨重的灾难，那么消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等人自然是功德无量了。郭廷以是这样评述的：“曾国藩之讨伐洪秀全，是自卫战争，文化战争，思想战争，卫道战争。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军之后，虽未能挽救了满清的最后命运，但洪秀全如果成功了，则中国社会伦理传统文化，将悉被破坏无遗。”如此褒贬，就和《清史稿》完全一致了。

甚至还有文章赞扬常胜军头目戈登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其作战目的乃一心解救中国人民之痛苦，俾早日脱离饥饿与死亡。”这篇题为《太平天国与列强之关系》的文章说：“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最大。她为争取在华经商的自由与平等，曾不惜使用武力，以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英国与美法二国显然采取了联合的政策。他们在华的最大的利益都是通商和传教，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利益倘因内战任何一方的攻击而蒙受损害，便应该使用武力保护权益。”这篇文章认为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是因为太平天国妨碍了外国人的利益。作者概括了三点：“其一为鸦片贸易，据东印度公司报告，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进口货以鸦片为大宗，每年所输入足抵出口之丝茶而有余。太平天国无论占据上海或革命成功，均对此项贸易不利。其二满清在北京条约中允许英法巨额赔款，如满清政府不保，英法便无法获得赔款。其三太平军纪律废弛，上海外人之财产总计二千五百万磅，恐太平军至，遭其抢掠。”“英国军队虽然已参加保卫上海之战争，其目的不过保护英国人在上海之利益，且当时上海为英法联军海陆军之补给中心，不容太平军侵占。”对常胜军头目，赞扬备至，说他“统兵作战才能与华尔相仿，但其为人与华尔迥异。彼之参战不为名利，乃基于同情心，欲中国人民早日脱离战乱，英国新任陆军提督柏郎愿竭力支持戈登，同意以英国正规军官替代常胜军中之‘冒险家’。”戈登是一个著名的侵略者，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任英军工兵少校，参与抢劫、焚烧圆明园的暴行。可是作者却说：“戈登其廉洁仁慈，常以自己薪饷救济部下。其作战目的乃一心解救中国人民之痛苦，俾早日脱离饥饿与死亡。”这种观点，在台湾史学界也是罕见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样褒扬戈登、贬抑太平天国，

（下转第59页）

于各种原因，又往往无法直接利用外文资料。而本书作者则不同，他不但对汉文资料可以直接利用和深有研究，而且对日本及西方一些国家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也可以博采广用，这就为本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提供了可靠保证。事实亦如此，作者在书中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是有一定深度的。例如：伯克制统治，是在维吾尔族中长期存在，被清朝统治者继承、改革和利用统治维吾尔族的一种主要制度，对维吾尔族历史的发展，以及对新疆历史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但是，对这一统治制度的研究，国内目前却进行得不多。作者在本书中，利用大量中外文资料，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且对与这一统治制度相适应的、在维吾尔族中长期严重存在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例如：对清代新疆经济方面的研究，也是新疆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书中特别有一章谈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对我们今后从事这方面研究也有一定启发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是“以中亚史为主题进行探讨的”，这就把新疆史的研究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础上。新疆是中亚一部分，在清代，新疆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中亚诸汗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日常政治、经济的往来和宗教、文化的交流非常频繁。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新疆与浩罕的关系，一再提到浩罕在新疆的活动和影响，并对哈萨克族与清朝政府之间的来往也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这些对于深入研究新疆史都是有帮助的。

在观点上，作者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也是比较客观的。例如：清代新疆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和卓后裔多次在南疆进行的政治、军事活动。对此，国外不少学者作过种种歪曲事实的描写和论述。作者在本书中则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从大、小和卓开始，到张格尔、玉素普、倭里罕，以及布素鲁克等和卓后裔在南疆的叛乱活动；对浩罕在和卓后裔叛乱中所起作用的叙述，也基本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对和卓家族中一部分人反对叛乱、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以及由于遭到各族人民反对而和卓后裔的每次叛乱都以失败告终的事实，也作了较为客观的介绍。

当然，由于作者阶级立场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本书中的错误也是明显的。如：书中把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这一中国内政问题与沙皇俄国在中亚地区的侵略扩张相提并论；把南疆一些地方统治集团称之为“民族阵线”；把维吾尔族中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称之为“捍卫伊斯兰”的“圣战”等，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作者所引用的大量史料相矛盾。

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历史专著。中译本的出版发行，必将对新疆史，特别是对清代新疆史的研究起极积的推动作用。

（上接第57页）

比《清史稿》还后退了一大步。1928年12月18日，故宫博物院经院委员讨论，呈清查禁《清史稿》的理由之一就是夸奖戈登平洪秀全之功。原呈说：“戈登为焚圆明园之祸首，其传中亦无记载，而反夸其平洪秀全之功。凡此诸端，皆足以证作史者之浅陋。”《清史稿》是否应该查禁，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它夸戈登平洪秀全之功，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太平天国与列强之关系》一文，不仅夸戈登平洪秀全之功，还夸他“廉洁仁慈”，“一心解救中国人民之痛苦”。这与《清史稿》相比，不是离史实更远了吗？